

党组织嵌入会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吗

于连超, 张卫国(博士生导师), 毕茜(博士生导师)

【摘要】以组织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基于2010~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考察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会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党组织嵌入董事会显著地改善了企业环境表现,但党组织嵌入监事会和管理层未能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党组织嵌入对弱环境制度地区和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完善党组织嵌入或治理参与机制和改善企业环境表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党组织嵌入; 企业环境表现; 环境制度; 市场化程度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9)16-0015-7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一直采用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此背景下,政府不断改革和完善环境制度。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的环境诉求也在不断上升,督促着环境制度的改革。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改善企业环境表现至关重要。因此,如何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备受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

大量国内外学者探讨了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因素,涵盖环境制度、税收政策、公司治理等方面。但企业环境治理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致使环境制度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受到制约。现有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会显著地提高国有企业董事会效率^[1]、缩小国有企业中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2]、防止国有资产流失^[3]、解决国有企业的劳资问题^[4]、提高

民营企业职工权益^[5]、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6]等。因此,本文以企业环境表现为落脚点,试图研究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以期在理论上丰富党组织嵌入的治理效应研究与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在实践上为完善党组织嵌入机制和改善企业环境表现提供重要的启示。

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丰富了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环境制度、税收政策、公司治理等方面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少有研究关注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而在我国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研究党组织嵌入这一政府干预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环境表现尤为重要,本文弥补了这一缺陷。第二,拓展了党组织嵌入的治理效应研究。现有研究聚焦于党组织嵌入对董事会效率、并购溢价、职工权益、薪酬差距、内部控制质量等方面发挥的治理效应,较少关注对企业环境表现的治理效应,本文拓展了党组织嵌入的治理效应研究。第三,现有研究探讨党组织嵌入如何影响企业行为时,未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本文从组织合法性理论出发,探讨了党组织嵌入如何影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保护费改税与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协调的政策设计与支撑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BJY060);中央高校基金重大培育项目“环境税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SWU1909205)

企业环境表现,建立了“党组织嵌入——组织合法性——企业环境表现”的逻辑框架,拓展了党组织嵌入治理效应的研究范式。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文献回顾

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党组织嵌入对企业行为会产生深刻的影响^[1-3]。Chang、Wong^[7]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显著地抑制大股东利益攫取行为进而提高企业绩效,显著提高管理者权力的政治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绩效。Li等^[8]发现,民营企业高管的党员身份会有效地提高企业获得贷款的概率和金额。马连福等^[1]发现,党组织的“双向进入”会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效率,党组织的“交叉任职”会显著提高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另外,党组织嵌入会扩大国有企业的冗余雇员规模,同时也会降低高管绝对薪酬^[2]。陈仕华、卢昌崇^[3]认为,党组织嵌入会显著地提高国有企业出售资产或股权时的并购溢价水平。周婷婷^[9]发现,党组织嵌入能有效地识别国有企业腐败高管利用风险信息进行免责的动机,致使其受到更严厉的惩罚。黄文锋等^[10]发现,党组织嵌入国有企业董事会显著地提高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平等化水平。Lu、Li^[4]发现,党组织在解决国有企业的劳资关系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董志强、魏下海^[5]发现,党组织嵌入促使民营企业合同签订率和人均培训支出提高。吴秋生、王少华^[6]发现,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内部控制质量呈倒U型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党组织嵌入影响企业环境表现的理论基础源于组织合法性理论。Suchman^[11]将组织合法性的内涵界定为:在由社会规范、价值观、信仰和定义构建的系统中,企业行为符合期望的、恰当的或合适的认定与假设。同时,Suchman^[11]进一步将合法性分为实効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在组织合法性的框架下,党组织嵌入主要通过发挥监督效应和制衡效应,来改善企业环境表现。

第一,党组织嵌入通过发挥监督效应改善企业环境表现。随着政府、债权人、公众等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诉求上升,企业环境表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例如:政府制定和执行更严格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督促企业改善环境表现;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环境治理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直线上升,尤其是上市公司的环境表现;债权人

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表现的要求也在不断上升,原因在于在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日趋严格的背景下,企业环境表现与经营风险密切挂钩,进而影响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等。但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往往以经济效益的损失为代价,致使企业提高环境表现的动力不足,这往往离不开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力量,党组织嵌入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马连福等^[1]发现,党组织嵌入通过发挥监督效应提高董事会效率和公司治理水平。吴秋生、王少华^[6]也发现,党组织嵌入通过发挥监督效应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而当企业环境表现不能满足政府、债权人、公众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诉求时,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地发挥监督效应以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首先,党组织嵌入能有效地纠正企业违反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在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的同时,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其次,党组织嵌入会正向反馈公众的环境诉求,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使得企业声誉也随之提高。最后,党组织嵌入会有效地迎合债权人的环境诉求,降低债权人的风险,使得企业融资成本也随之降低,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8]。

第二,党组织嵌入通过发挥制衡效应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其一,党组织嵌入能有效地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进而改善企业环境表现。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经理人的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由于企业环境表现往往不属于经理人的考核指标,所以经理人一般会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12]。而股东的目标是包含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内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原因在于虽然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会给企业带来直接的现金流入,但会影响企业声誉、贷款可得性、消费者认可度等方面,进而深刻地影响企业的价值创造。股东和经理人的目标差异,使得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企业的环境表现恶化,而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地缓解这一代理冲突。当经理人以牺牲环境表现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时,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时,将站在股东的利益角度进行决策、监督和执行,及时地纠正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3],使之与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其二,党组织嵌入能有效地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进而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会损害企业环境表现。大股东拥有企业实际控制权,可能存在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进而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和负向影响企业环境表现的情形。Chang、Wong^[7]发现,党组织嵌入能有效地抑制大股东的利益攫取行为。当大股东为了攫取利益而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时,党组织嵌入参与到决策、监督和执行中去,将有效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党组织嵌入会显著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

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会受到环境制度的影响。我国一直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不断地改革和完善环境保护制度。毕茜等^[13]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确立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改善了企业环境表现。当环境制度较弱时,环境制度对企业环境表现的作用也会随之减弱,党组织嵌入所发挥的监督效应和制衡效应可弥补这一不足,进而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当环境制度较强时,环境制度对企业环境表现的作用也会随之增强,党组织嵌入所发挥的监督效应和制衡效应会减弱,表现为对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弱化。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与强环境制度地区企业相比,党组织嵌入对弱环境制度地区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更显著。

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会受到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市场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力量的强弱。党组织嵌入本身也是政府干预的一种手段^[3],当市场化程度较低时,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此时企业为了获取政治关联而更加配合党组织嵌入,进而有利于党组织嵌入发挥监督效应和制衡效应,提高企业环境表现。而当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市场主导资源配置,此时企业的目标在于获取市场的认可以期获得更多的资源,这可能会弱化党组织嵌入所发挥监督效应和制衡效应的效果,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也会减小。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相比,党组织嵌入对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和讯网所披露的企业环境责任数据始于2010年,故本文选取2010~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同时,本文对研究样本作如下筛选:删除金融类行业的样本,删除ST、*ST、PT样本,

删除核心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本文数据来源如下:企业环境表现的数据由笔者根据和讯网所披露的企业环境责任评分手工整理所得;党组织嵌入的数据是由笔者通过年度报告、企业官网、新浪财经等渠道手工收集和整理所得;控制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同时,本文对连续变量均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第一,企业环境表现(CEP)。本文借助和讯网所披露的企业环境责任评分衡量企业环境表现,并且加上1取自然对数,即企业环境表现= $\ln(\text{企业环境责任评分}+1)$ 。第二,党组织嵌入。借鉴陈仕华、卢昌崇^[3]的方法,本文使用是否存在党组织成员兼任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管理层成员的虚拟变量衡量党组织嵌入,即党组织成员兼任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成员时党组织嵌入(Party)取1,否则取0;党组织成员兼任董事会成员时党组织嵌入董事会(Party_D)取1,否则取0;党组织成员兼任监事会成员时党组织嵌入监事会(Party_S)取1,否则取0;党组织成员兼任管理层成员时党组织嵌入管理层(Party_M)取1,否则取0。第三,调节变量。环境制度的测度借鉴毕茜等^[13]的研究方法,市场化程度的测度借鉴王小鲁等^[14]的研究方法。第四,控制变量(CV)。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企业规模(Size),即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财务杠杆(Lev),即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资产报酬率(Roa),即净利润占平均资产总额的比例;企业成长性(Growth),即销售收入增长率;企业年龄(Age),即企业成立时间的自然对数;产权性质(State),国有控股取1,否则取0;两权分离率(Sep),即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比例与控制权比例之差;董事会规模(Bsize),即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独立董事比例(Id),即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两职合一(Dual),若董事长和总经理不由同一人兼任取1,否则取0。另外,还控制了年度效应(Year),即年度虚拟变量;行业效应(Ind),即行业虚拟变量;省份效应(Prov),即省市虚拟变量。

(三)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所示的多元回归模型:

$$CEP_{i,t} = \alpha_0 + \alpha_1 Party_{i,t} + \sum_{i=1}^n \beta_i CV_{i,t} + \theta_m Year + \delta_n Ind + \zeta_q Prov + \varepsilon_{i,t}$$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第一,企业环境表现。企业环境表现(CEP)的均值为0.421,中位数为0.000,最小值为0.000,最大值为3.434,标准差为0.979,说明不同企业的环境表现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且呈现高低两极分化的趋势。第二,党组织嵌入。党组织嵌入(Party)的均值为0.564,说明超过56%的企业存在党组织嵌入的情况。同理,超过46%的企业存在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的情形,超过26%的企业存在党组织嵌入监事会及管理层的结论与上述结论一致。第三,控制变量。除企业规模(Size)、企业成长性(Growth)、两权分离率(Sep)的标准差超过1.000外,其他控制变量的标准差均小于1.000,变量的波动幅度较小。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CEP	15057	0.421	0.000	0.000	3.434	0.979
Party	15057	0.564	1.000	0.000	1.000	0.496
Party_D	15057	0.463	0.000	0.000	1.000	0.499
Party_S	15057	0.263	0.000	0.000	1.000	0.441
Party_M	15057	0.271	0.000	0.000	1.000	0.445
Size	15057	22.178	22.031	19.346	26.054	1.312
Lev	15057	0.459	0.454	0.048	0.965	0.216
RoA	15057	0.020	0.018	-0.085	0.112	0.029
Growth	15057	0.495	0.138	-0.748	11.476	1.540
Age	15057	2.728	2.833	1.386	3.367	0.395
State	15057	0.432	0.000	0.000	1.000	0.495
Sep	15057	5.651	0.001	0.000	29.123	7.923
Bsize	15057	2.151	2.197	1.609	2.708	0.197
Id	15057	0.373	0.333	0.333	0.571	0.053
Dual	15057	0.754	1.000	0.000	1.000	0.431

(二)均值差异性检验

均值差异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党组织嵌入组的企业环境表现均值比党组织未嵌入组显著高0.302,说明党组织嵌入组的企业环境表现整体高于党组织未嵌入组。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的结论与上述结论一致。

(三)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环境表现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环境表现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回归系数为0.13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党组织嵌入会显著地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党组织嵌入董事会

表2 党组织嵌入分组下企业环境表现的均值差异性检验

分组		均值	95%的置信区间	差异	T值
Party	Party=1	0.553	0.530-0.576	0.302	18.982***
	Party=0	0.251	0.232-0.269		
Party_D	Party_D=1	0.556	0.531-0.582	0.251	15.816***
	Party_D=0	0.305	0.286-0.323		
Party_S	Party_S=1	0.635	0.599-0.671	0.290	16.142***
	Party_S=0	0.345	0.328-0.362		
Party_M	Party_M=1	0.636	0.600-0.671	0.294	16.512***
	Party_M=0	0.341	0.325-0.359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党组织嵌入监事会与管理层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当党组织嵌入董事会时,党组织嵌入会显著地改善企业环境表现,但当党组织嵌入监事会或管理层时,党组织嵌入未能显著地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因此,H1得证。

(四)环境制度、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环境表现

环境制度、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环境表现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弱环境制度地区企业样本中党组织嵌入的回归系数为0.17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强环境制度地区企业样本中党组织嵌入的回归系数为0.12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的结果显示,弱环境制度地区企业样本中党组织嵌入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强环境制度地区企业样本(P值为0.0231),说明党组织嵌入显著地改善了弱环境制度地区企业的环境表现,同时也能显著地改善强环境制度地区企业的环境表现,但与强环境制度地区企业相比,党组织嵌入对弱环境制度地区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更显著。因此,H2得证。

(五)市场化程度、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环境表现

市场化程度、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环境表现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样本中党组织嵌入的回归系数为0.18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样本中党组织嵌入的回归系数为0.12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同时,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的结果显示,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样本中党组织嵌入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样本(P值为0.0192),说明党组织嵌入显著地改善了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的环境表现,同时也能显著地改善高市场化程度地区

表3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环境表现

变量	CEP			
	(1)	(2)	(3)	(4)
constant	-7.820*** (-14.359)	-7.821*** (-14.386)	-7.906*** (-14.503)	-7.919*** (-14.535)
Party	0.130*** (2.959)			
Party_D		0.133*** (3.140)		
Party_S			0.023 (0.540)	
Party_M				0.010 (0.238)
Size	0.353*** (20.424)	0.354*** (20.488)	0.354*** (20.348)	0.355*** (20.402)
Lev	-0.648*** (-6.031)	-0.643*** (-5.981)	-0.640*** (-5.933)	-0.645*** (-5.998)
Roa	2.012*** (2.955)	2.062*** (3.017)	1.987*** (2.904)	1.964*** (2.883)
Growth	-0.012 (-1.031)	-0.011 (-0.974)	-0.012 (-1.030)	-0.012 (-1.026)
Age	0.262*** (3.759)	0.267*** (3.846)	0.272*** (3.911)	0.273*** (3.929)
State	0.085* (1.907)	0.080* (1.785)	0.125*** (2.839)	0.129*** (2.975)
Sep	-0.001 (-0.512)	-0.001 (-0.506)	-0.001 (-0.426)	-0.001 (-0.405)
Bsize	0.158 (1.396)	0.155 (1.378)	0.190* (1.694)	0.192* (1.704)
Id	0.352 (0.843)	0.325 (0.780)	0.400 (0.957)	0.402 (0.960)
Dual	-0.003 (-0.059)	-0.000 (-0.008)	0.010 (0.224)	0.010 (0.225)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5057	15057	15057	15057
adj. R ²	0.284	0.284	0.282	0.282

注:***和**分别表示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下同。

企业的环境表现,但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相比,党组织嵌入对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更显著。因此,H3得证。

(六)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在梳理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环境表现的逻辑机理后,本文可能存在以下方面的内生性问题:第一,遗漏变量问题。多元回归模型中控制了企业基本特征、公司治理因素、行业效应、年度效

表4 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表现影响的异质性

变量	CEP			
	环境制度弱 (1)	环境制度强 (2)	市场化程度低 (3)	市场化程度高 (4)
constant	-3.218*** (-4.792)	-7.655*** (-8.255)	-8.963*** (-10.393)	-7.679*** (-9.226)
Party	0.176*** (2.927)	0.129*** (2.734)	0.183*** (3.157)	0.121** (2.459)
CV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Diff(P值)	0.0231**		0.0192**	
N	7528	7529	7528	7529
adj. R ²	0.202	0.266	0.368	0.224

应、地区效应等因素,但仍可能遗漏了某些影响企业环境表现的重要变量。第二,自我选择问题。党组织嵌入数据主要是手工收集而得,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第三,双向因果问题。可能正是由于企业的环境表现差,才促使党组织积极参与公司治理,这其中可能存在双向因果问题。为了缓解以上内生性问题,本文进行如下内生性测试:

(1)工具变量法。为了避免遗漏变量问题,本文选取党组织嵌入的行业均值(不考虑企业自身党组织嵌入)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选取党组织嵌入的行业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第一,同行业党组织嵌入与企业自身党组织嵌入密切相关。公司高管行业知识和行业经验的积累,限制了高管的跨行业流动,高管往往在同一行业流动,致使同行业高级人才队伍特征保持相对稳定,同时党组织建立也存在羊群效应,企业自身党组织嵌入特征与同行业其他企业党组织嵌入特征的相关性较大。第二,同行业党组织嵌入与企业自身环境表现不相关。在计算同行业党组织嵌入时不考虑企业自身党组织嵌入,消除一定的噪音。而且,同行业党组织嵌入会参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董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管理层执行等方面,但不会对企业自身环境表现产生直接的影响。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2)Heckman两阶段回归法。为了缓解自我选择问题,本文使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法重新进行回归,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以党组织嵌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入同行业党组织嵌入和已有控制变量进行Logit回归,并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MR);第二步,以企业环境表现作为被解释变量、党组织嵌入作为解释变量,加入IMR和已有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估

表 5 工具变量法(第一阶段)

变量	(1)	(2)	(3)	(4)
	Party	Party_D	Party_S	Party_M
constant	-1.359*** (-5.772)	-1.318*** (-5.071)	-1.270*** (-5.574)	-1.303*** (-5.437)
IV_Party	0.667*** (3.657)			
IV_Party_D		0.713*** (3.362)		
IV_Party_S			0.808*** (4.342)	
IV_Party_M				0.760*** (4.300)
CV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5057	15057	15057	15057
adj. R ²	0.281	0.273	0.162	0.200

表 6 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

变量	CEP			
	(1)	(2)	(3)	(4)
constant	-10.300*** (-8.698)	-9.502*** (-9.719)	-7.115*** (-8.501)	-8.916*** (-10.178)
Party	2.826** (2.505)			
Party_D		1.930** (2.204)		
Party_S			0.807 (1.391)	
Party_M				1.018 (1.614)
CV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5057	15057	15057	15057
adj. R ²	0.285	0.286	0.282	0.283

计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3)倾向匹配得分法。为了进一步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样本匹配,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使用已有控制变量将实验组与控制组进行匹配,删除未被匹配到的研究样本,匹配方法采用无放回一比一最近邻匹配法;第二步,在匹配后样本的基础上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2. 改变企业环境表现的衡量方法。前文使用和和讯网所披露的企业环境责任评分衡量企业环境表现,并且加上 1 取自然对数。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从污染排放、环境管理、社会影响三个方面构建企业环境表现的综合评价体系,并使用其 AHP 方

表 7 Heckman 两阶段回归法(第二阶段)

变量	CEP			
	(1)	(2)	(3)	(4)
constant	-8.426*** (-11.109)	-8.323*** (-11.014)	-8.265*** (-10.961)	-8.252*** (-10.929)
Party	0.141*** (3.184)			
lambda_Party	0.194 (1.226)			
Party_D		0.145*** (3.336)		
lambda_Party_D		0.159 (1.014)		
Party_S			0.009 (0.214)	
lambda_Party_S			0.106 (0.679)	
Party_M				0.013 (0.296)
lambda_Party_M				0.103 (0.660)
CV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5057	15057	15057	15057
adj. R ²	0.284	0.285	0.282	0.282

表 8 倾向匹配得分法

变量	CEP			
	(1)	(2)	(3)	(4)
constant	-8.395*** (-13.861)	-8.362*** (-13.823)	-8.466*** (-13.963)	-8.507*** (-14.054)
Party	0.107** (2.197)			
Party_D		0.136*** (2.900)		
Party_S			0.030 (0.642)	
Party_M				0.009 (0.195)
CV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3128	13932	7934	8162
adj. R ²	0.321	0.322	0.320	0.320

法下的权重设定,进而测度企业环境表现,然后重新进行回归。

3. 改变党组织嵌入的衡量方法。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借鉴马连福等^[2]的研究方法,使用在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兼任的党组织成员数量占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成员总数的比例衡量党组织嵌入,重新进行回归。

以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均支持前文的研究结论,但由于篇幅所限,部分结果未予以列示。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组织合法性理论为基础,基于2010~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从企业环境表现的视角考察了党组织嵌入的非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第一,党组织嵌入能显著地改善企业环境表现;第二,党组织嵌入董事会能显著地改善企业环境表现,但党组织嵌入监事会和管理层未能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第三,党组织嵌入对弱环境制度地区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明显大于强环境制度地区企业;第四,党组织嵌入对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明显大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

本文的结论在理论上丰富了党组织嵌入的治理效应研究和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在实践上为完善党组织嵌入或治理参与机制及改善企业环境表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进一步地完善党组织在弱环境制度地区企业中的嵌入机制,使得党组织嵌入更好地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实证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存在环境制度差异,即对弱环境制度地区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明显大于强环境制度地区企业。在弱环境制度地区,党组织嵌入能有效地弥补环境制度的薄弱,促进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党组织在弱环境制度地区企业中嵌入的方式、程度和深度,弥补环境制度的不足。第二,进一步完善党组织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中的嵌入机制,使得党组织嵌入更好地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实证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对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存在市场化程度差异,即对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作用明显大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应充分发挥党组织嵌入的监督效应和制衡效应,改善企业环境表现。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党组织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中嵌入的方式,确定适当的嵌入程度,弥补市场化建设的不足。

主要参考文献:

[1] 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中国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内部人控制”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2(8):82~95.

- [2] 马连福,王元芳,沈小秀.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冗余雇员与高管薪酬契约[J].管理世界,2013(5):100~115.
- [3] 陈仕华,卢昌崇.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治理参与能够有效抑制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吗?[J].管理世界,2014(5):106~120.
- [4] Lu J., Li M.. How do party organizations'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s control worker unrest? A case study on a Chinese resource-based state-owned enterprise [J]. Employee Relations, 2017(2):184~203.
- [5] 董志强,魏下海.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积极作用——以职工权益保护为例的经验研究[J].经济动态,2018(1):14~26.
- [6] 吴秋生,王少华.党组织治理参与程度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基于国有企业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5):50~58.
- [7] Chang E. C., Wong S. M. L.. Political control and performance in China's listed firm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4(4):617~636.
- [8] Li H., Meng L., Wang Q., et al.. Political connections, financ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2):283~299.
- [9] 周婷婷.国企高管腐败、风险信息与责任承担——基于党组织甄别免责动机的视角[J].财贸研究,2016(6):122~130.
- [10] 黄文锋,张建琦,黄亮.国有企业董事会党组织治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公司绩效[J].经济管理,2017(3):6~20.
- [11] Suchman M. C..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3):571~610.
- [12] 于连超,张卫国,毕茜.盈余信息质量影响企业创新吗?[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8(12):128~145.
- [13] 毕茜,彭珏,左永彦.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公司治理和环境信息披露[J].会计研究,2012(7):39~47.
- [14]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225.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